

现代公共精神的重塑 ——来自监利的报告

周庆智 蔡礼强 著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PUBLIC SPIRIT:
A REPORT FROM JIANLI

智庫 中社

国家智库报告 2019(16)
National Think Tank

国家治理

现代公共精神的重塑 ——来自监利的报告

周庆智 蔡礼强 著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PUBLIC SPIRIT:
A REPORT FROM JIANL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公共精神的重塑：来自监利的报告 / 周庆智，蔡礼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6

(国家智库报告)

ISBN 978 - 7 - 5203 - 4652 - 8

I. ①现… II. ①周…②蔡… III. ①精神文明建设—
研究报告—监利县 IV. ①D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2264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王 茵
责任编辑 喻 苗
特约编辑 王 琪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115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摘要：来自监利“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中公共救援的报告表明，现代公共精神的重塑，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互为支撑并形成国民共同体的凝聚力，即孕育于国民共同体的公共精神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支持力量：一是公共组织（政府）与个体民众紧密相关的现实政治权益联系；二是基于价值共享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意识。本报告围绕政治权益联系与文化价值联系对监利人民在“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中所展现的公共精神进行讨论，试图辨识政治凝聚纽带与文化凝聚纽带如何把个体民众与公共组织（政府）密切联结起来，其所揭示的公共精神的本质如何贯穿于监利公共精神的建构当中，并指出监利公共精神的内涵对构建新时代中国公共伦理和公共精神所具有的示范或启示意义。从监利个案中，能够概括和提炼出当今中国公共精神的核心元素，或者说，监利人民展示出来的基于政治权益联系与文化价值联系基础上的现代公共精神，具备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公共生活伦理的基础价值建构意义。

关键词：监利；现代公共精神；政治联系与文化联系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capsized “Oriental Star” in Jianli, the remodeling of modern public spirit lies i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teractively support each other and the community cohesion that formed by them, that is public spirit mainly comes from two things: one is the closely linked political rights betwee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s; another one is the cultur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based on shared value. This report focuses on the public spirit demonstrated by the accident of “Oriental St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ies, trying to identify that how do those ties link the populace and the government together, and how does the essence of public spirit permeat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irit, and pointing out the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rom Jianli cas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ethics and public spirit of new era. From the case of Jianli, we can summarize and generalize the core element of public spirit in today’s China, or the modern public spirit based on tho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ies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basic constructional value to social public life in current transitional period.

Key Words: Modern public spirit; Jianli Ca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ies

前 言

2015年6月1日晚，载有456名乘客的“东方之星”客轮在长江监利段翻沉（简称“6·01”事件）。事件发生后，160多万监利人民齐心协力，从党员干部到普通市民，从企业家到个体工商户，从私家车到出租车，纷纷加入志愿者行动，展现出监利人民的大义、大爱、责任和担当。

监利人民在“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的救助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共精神，与人们对当前社会公共生活缺乏意义的集体焦虑以及物欲主义、消费主义造成公共社会环境“世风日下”的普遍忧虑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们惊异于监利人民在公共危机面前所呈现出来的“监利力量”和“小城大爱”，那么蕴含于监利人的那种公共精神的底蕴是什么？其鲜明的时代印记是什么？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精神的重塑具有什么启示意义？

对监利公共精神的挖掘之所以有现实意义，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形式和公共精神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和转型。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从单位社会的集体主义公共生活形式，逐渐进入后单位社会的公共生活形式的转型当中。个体民众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回归于个人生活，个体的人生目标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诉求回归到现实的家庭与个人生活当中。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的集体主义价值被全面解构。或者说，在单位社会生活的整体意义被解构之后，个体不必再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而是被纳入了资本逻辑当中，并与原有的社会整体相脱离，个体不可能从社会整体中确立自己的意义。^① 因此，确认新的社会伦理共同体的历史文化根基与建构新的公共价值，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公共精神的建构，一定是基于人们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价值浑融生成的基础之上，所以，从传统的（具体关系组成的联合体）文化凝聚纽带上升为公共社会的（抽象关系组成的联合体）政治凝聚纽带，重构一种有序、多元的公共伦理价值和公共精神，对现代公共生活方式的生成和确立，从而实现一种自治的

^① 王立胜、王清涛：《资本逻辑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文化纵横》2016年10月刊。

社会组织形式，具有社会整合和公共政治秩序建构意义。

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缺乏公共伦理意义和公共精神，始于市场化改革而至于当今。之前个体民众依附于单位组织形式当中，支持这样公共生活的意义体系是外在的革命化集体主义价值，个体民众的精神世界与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依附性关系的公社体制后，一方面，国家权力上收至乡镇一级，抽身于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之外；另一方面，农民回到了家庭（家族）单元当中，个人生活的意义和公共生活的伦理意义回落到传统、习俗、习惯和惯例等构成的家庭本位文化规范上。乡村公共生活伦理发生了裂变，即原来的公共价值意义不在，但新的公共价值意义也没有形成，这导致乡村公共生活式微，公共伦理缺失，乡村公共生活意义处于失序的多元图式当中。

在这个意义上，解析监利所体现的公共精神内涵主要为以下方面：第一，监利在“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中表现的“小城大爱”所蕴含的公共精神的核心意涵是什么；第二，在什么意义上，监利公共精神可以被赋予新时代中国公共精神建构的崭新意义；第三，监利公共精神体现的价值元素如何才能融合于当

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建构之中。

公共精神孕育于公共社会之中最深层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①或者说，公共精神的实质就是政治利他主义，认为这种利他能够促使公民关心公共事务并超越私人利益，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之中。^②概言之，公共精神成长于公共领域，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连，以公共性为价值依归，是位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基本道德与政治秩序观念、态度和行为取向。它包括独立的人格精神、社会公德意识、自律自制的行为规范、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政治利他、爱心和奉献等公共价值与信念等。

解析监利案例所体现的公共精神，我们需要从政治与文化这两类组织化力量对于公共社会的内聚作用，来展开讨论和分析。因为，从人类经验上看，将一个国家的公民共同体凝聚起来的无非是这两个纽带——政治纽带和文化纽带。所谓政治纽带，乃以国家、团体、个人的权利配置等抽象关系组成联合体，根据对权益配置的同意及约束形成内聚。所谓文化纽带，乃

① 马斌：《公共精神之解读》，《传承》2010年第8期。

② [美]珍妮特·登哈特、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以家庭、家族、宗族、村社共同体、种族、民族等具体关系组成联合体，根据共享的历史、血缘、地缘、语言等因素形成内聚。两者都以创造共享互赖关系而促成社会连接，但由于文化纽带的扩展受到同质性和前在性的限制，其整合优势在同质性社会中较明显。而政治纽带可以通过选择性竞争程序的设置，跨越社会类别协调分歧，因而它在异质社会的条件下，更具社会整合优势。^① 因此，本报告对监利公共精神的讨论就是围绕着政治与文化这两个联结公共领域的凝聚纽带，试图辨识政治纽带与文化纽带如何把个体民众与公共组织（政府）密切联结起来，其所揭示的公共精神的本质如何贯穿于监利公共精神的建构当中，并指出监利公共精神对构建新时代中国公共伦理和公共精神所具有的示范或启示意义是什么。

来自监利的报告表明，当今中国的公共领域并不缺失价值和意义，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互为支撑并形成共同体的凝聚力，即孕育于国民共同体的公共精神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支持力量：一是公共组织（政府）与个体民众紧密相关的现实政治权益联系；二是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上的共同体意识。这两方面的阐述主要围绕公共组织（政府）的公共

^① 张静：《社会整合纽带比较：文化与政治》，《二十一世纪》第140期，2013年12月号。

性、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公共领域的形成、社会组织的发展、公共性社会关系性质的变化及其利益基础和价值基础、社会成员体系的凝聚力等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是现代公共精神形成的核心要件和结构性条件。事实上，监利基于政治权益联系与传统文化联系基础上的现代公共精神，具备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基础价值建构意义。进一步讲，从监利个案中，我们能够概括和提炼出当今中国公共精神的核心元素，并且，我们认为这些核心元素对当今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和公共精神的建构具有广泛的、现实的、深远的政策启示和示范意义。

目 录

前言	(1)
一 公共领域的内聚力与现代公共精神	(1)
(一) 政治与文化的联结纽带	(10)
(二) 公民共同体的公共精神	(12)
(三) 公共领域转型与公共精神演变	(15)
二 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结构变化	(23)
(一) 社会转型	(23)
(二) 社会组织结构变化	(25)
三 政府治理转型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31)
(一) 政府治理转型	(31)
(二) 服务型政府建设	(35)

四 公共组织（政府）与个体的权益关联和价值关联	(43)
(一) 政府能力建设	(45)
(二) 行政伦理与公共精神	(49)
五 社会组织对现代公共精神的建构作用	(69)
(一) 社会组织与公共组织（政府）的 制度化关系	(70)
(二) 现代社会组织的治理意义	(87)
六 基于政治与文化联系的现代公共精神 内涵	(105)
(一) 公共精神的政治关联	(106)
(二) 公共精神的文化关联	(112)
七 现代公共精神的重塑：监利的启示和 示范意义	(119)
(一) 公共生活方式与公共精神	(121)
(二) 现代公共精神的建构含义	(125)
附录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调查问卷	(133)
参考文献	(146)

一 公共领域的内聚力与 现代公共精神

在“6·01”公共危机事件当中，监利党政系统具备了很强的公共危机处置能力，不仅如此，全体监利人民上下一心，展示出令人振奋的公共精神。其间，全县共累计接待乘客家属 2262 人，涉及乘客 455 名，累计接待对口省份工作人员 1364 人，媒体记者 890 人，安排在城区 152 家大小酒店、宾馆、旅社及 45 户爱心家庭，累计提供床铺 4000 多个，有 26 家机关、企业和学校为来监利人员提供食宿便利及办公场所。公共体制与社会力量团结一心，展示出强有力的现代公共精神。

在公共体制这一边，监利县委县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强有力的公共危机处置能力和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第一，全面组织动员。一是部署周密。县党政系

统领导第一时间组织政府办、安监、公安、海事、交通、民政、卫生等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着手展开事故救援及相关工作。组织有 1000 多名民兵的应急分队第一个抵达事故现场。组织投入救护车 60 台，对第一时间发现的生还人员迅速安排救治。组织沿江乡镇干部群众 2500 多人在辖区江段江面开展拉网式搜救，组织 150 多艘船只在江面配合搜救，并成立了长江游轮侧翻事件处理工作指挥部，同时组成搜救、善后、宣传、保卫、接待、事故协助调查六个工作专班，全力以赴投入救援和服务工作。二是全面动员。翻沉事件发生后，县委、县政府思想高度统一，全面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救援工作。全县各县直单位、乡镇的所有机关干部，迅速投入救援、保障和服务当中。同时，通过县域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救助和服务工作。

第二，服务保障有力。一是妥善接待乘客家属。向媒体公布了一部办公电话以及一部手机号码，24 小时不间断地接受乘客家属咨询，引导乘客家属来监，同时，加强对县内志愿者的调度和指导，服务乘客家属。为了确保每一个乘客家属来监利后能够有一个安心的环境，政府在随岳高速监利入口处设置了接待站，在医院、宾馆等地设置了咨询点，成立了巡回医疗队，组织了 183 支工作队、共 1600 多名工作人员，按照 1

名来监乘客家属对口安排 1 名工作人员的标准，为乘客家属提供免费的食宿、医疗、交通、精神抚慰等方面的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乘客家属各方面的需求。二是做好后勤保障。调配一切可以调配的资源，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认真做好人员调度、物资保障。截至 6 月 12 日，在事件处置过程当中，监利县已投入人力 12500 多人，投入物资费用近 9000 多万元。三是协助善后处置。其一是开展了 DNA 比对及结果交接工作。其二是全力做好遇难者遗体告别工作。其三是开展了遗失物清理和认领工作。其四是切实加强疾病防控工作。其五是全力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在社会力量参与这方面，监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所体现的公共精神，主要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社会组织发挥作用。6 月 3 日在县委动员会议召开后，监利广播电台发出了“黄丝带”爱心车倡议，市民踊跃响应，纷纷参与。“黄丝带”将服务对象范围从远道而来的寻亲家属，扩大到救援部队、志愿者和媒体记者，除提供交通通行外，还提供食品、住宿等各种服务，成为监利最感人的色彩。整个救援善后期间，共有 3000 多台私家车和出租车车主加入爱心行列，累计从武汉、荆州、岳阳和潜江 4 个主要站口接送 1000 多人次，城区接送 8000 多人次，平均每

一辆黄丝带车辆免费接送3人次以上。

第二，民众自发参与。事件发生以来，监利市民自发开展了全城志愿服务行动。其间，共有5000多名志愿者为家属开展各种服务，全县的医院、城区等主要路口、遗失物认领处、殡仪馆，也都活跃着广大市民志愿者的身影，哪里需要人手，他们就第一时间顶上。不少市民志愿者购买矿泉水和方便面，开车送往各大酒店、武警官兵驻扎基地、高速出口等。任何一条和救援保障有关的信息被转发到朋友圈或者微博，3分钟内就有志愿者提供帮助，得到解决，监利群众的正能量令世界感动。

第三，社会互助行动。接待家属的房源不足，后方指挥部向社会发布消息征集房源。短短一个小时，就收集到200套房源。不少城区居民将自己的住房收拾干净，备好热水热饭，以满足来监人员住房需要。监利城区千禧大酒店为乘客家属及救援人员免费提供食宿，为救援一线官兵每天免费准备几百份盒饭，为住宿的乘客家属和参与救援人员免费提供三餐。虽然高考在即，所有预定了酒店的家长、考生也顾全大局，主动腾出房间，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拿出来保障救援、接待乘客家属。

第四，民营企业组织参与。沉船事件发生后，监利的大小企业都争先恐后地投入救援行动。玉沙集团